

# 張春橋的「叛徒」與 黨員身份之謎

• 陳東林

## 一 毛澤東為甚麼沒有選擇張春橋作為接班人

張春橋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筆桿子和首席理論家。

從1964年策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中共中央許多重大文件和文章都出自張春橋之筆或經其重要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評「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等等。連家喻戶曉的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也由張起草修改。集中反映文革理論的中共九大報告，原先由陳伯達起草，後毛決定交給張春橋、姚文元起草。中共十大報告也是張主持寫成。

張春橋和姚文元在1967年2月最早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理論，11月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完整理論。他們還提出了教育戰線「兩個估計」和「全面專政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文革典型理論。因此1975年上海「四人幫」黨羽提出「張春橋思想」是「第四個里程碑」，是有所本的<sup>①</sup>。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從未見到毛澤東比較嚴厲地批評張春橋。

另一方面，張春橋與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貴不同，有着抗戰前參加革命的資歷，是個延安出來的老幹部，而且從基層提升起來，歷經上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成員，延安陝北公學宣傳科科長，《晉察冀日報》總編輯<sup>②</sup>，石家莊市委秘書長，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處書記等職務。1917年出生的他，文革中五十來歲，年齡又較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等有合適的差距。

以上種種因素，使得毛澤東曾經幾次考慮過把張春橋作為接班人。一次，毛與林彪談到林之後誰接班的問題，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引起了林的極大疑慮。周恩來逝世後，1976年春，毛考慮接班人時，又想過張春橋。

毛澤東曾經幾次考慮過把張春橋作為接班人。一次，毛與林彪談到林之後誰接班的問題，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周恩來逝世後，毛考慮接班人時，又想過張春橋。但張的歷史問題是一個致命弱點。

\* 本文為筆者擬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張春橋姚文元合傳——自傳和檔案的揭秘》中的一節。

毛澤東為甚麼最終沒有選擇張春橋作為接班人？張的歷史問題是一個致命弱點，而且在文革後期的高層激烈鬥爭中成為一個隱秘焦點，至今仍然是個沒有完全解開的謎。

1967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狂飆。各路反張群眾組織的武器，就是張春橋曾經是「叛徒」的歷史，以及他1930年代以「狄克」為筆名寫文章攻擊魯迅。

1971年，林彪集團在〈「571工程」紀要〉裏明明白白地寫道：「一定要把張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雖然中央當作罪證發文時加了個註腳：「這是林彪一夥對張春橋同志的造謠污蔑和陷害。」<sup>③</sup>但並沒有說明根據，反而等於把張的「叛徒」問題昭示天下。因此，當時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這樣印發，但毛澤東不知出於甚麼考慮，執意要這樣做。

1973年4月9日，剛復出的鄧小平、卓琳夫婦來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周恩來。這是時隔七年之後兩家人的第一次會面。周恩來首先說的話，就是「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又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sup>④</sup>

1974年12月26日，周恩來在長沙與毛澤東單獨談話，周說，懷疑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只表示已經知道了<sup>⑤</sup>。

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對王海容、唐聞生說：我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有件心事總放不下，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讓我看的。你們可以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他們可以證實江青、張春橋是叛徒。他還說，這事他在延安的時候就已經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毛澤東反映。王、唐把此事告訴了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sup>⑥</sup>。

同年12月，奄奄一息的康生突然提出要到醫院去看望同樣久病不起的周恩來。救護車開進院子，躺在擔架車上的康生吸着氧、輸着液，掙扎着與周恩來單獨在房間密談了一個小時<sup>⑦</sup>。偶爾進去的醫護人員聽到，他們在談論江青、張春橋的叛徒歷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寫報告給毛澤東，周認為康生作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單獨給毛寫報告<sup>⑧</sup>。

1976年4月下旬，江青聽聞康生生前有此舉動，找章含之問情況。4月25日章給毛澤東寫了關於康生揭發江、張歷史問題的報告。5月13日，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要章含之和她的丈夫、外交部部長喬冠華把所有情況向中央五人小組匯報。5月17日，喬、章向包括張春橋在內的五人小組當面匯報了康生的揭發情況。江青在喬、章寫的材料上批示：「此類事逐漸會揭發出來，我看他們是否高超過林彪？據說，他們的大、小艦隊活動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艦隊有過之而無不及。」又表示自己「吃的飽飽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sup>⑨</sup>但張春橋沒有寫一個字。

7月下旬，江青說有要緊的事，毛派張玉鳳去聽。江說：釣魚台八樓那個人（指康生）已經好幾次不省人事了，病得不行了還整我，說我歷史有問題，是叛徒。張回來向毛匯報後，毛沒說話，只點點頭<sup>⑩</sup>。

江、張歷史問題的地雷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爆炸。行動前夕，華國鋒問汪東興，如何整理「四人幫」專案材料？汪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已經準備好了，一

1977年3月6日發出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指出張春橋「一九三三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指使下，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瘋狂反對魯迅」，「偽造入黨歷史」。

查檔案就可以解決。10月7日，即隔離「四人幫」後的第二天，華國鋒給公安部副部長嚴佑民寫了一張條子，要他去中央組織部調走了「四人幫」的絕密歷史檔案。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王張江姚專案組編寫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指出：「根據大量的確鑿的證據，現已查明，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份子」，主要依據是：「在濟南正誼中學充當國民黨特務」，「一九三三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の指使下，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瘋狂反對魯迅」，「偽造入黨歷史」<sup>⑪</sup>。

但是，材料並未能證實「叛徒」說法——因為張春橋從來沒有被捕過。這些雖然只是文革前的個人歷史問題，但是，在文革那個依靠專案定性的時代，就成為可以左右接班人決策、改變國家歷史的大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張的歷史問題進行一番考證。

1977年3月的材料並未能證實「叛徒」說法——因為張春橋從來沒有被捕過。這些雖然只是文革前的個人歷史問題，但是，在文革那個依靠專案定性的時代，就成為可以左右接班人決策、改變國家歷史的大問題。

## 二 關於「一九三三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

1933年，張春橋十六歲，在濟南正誼中學（今濟南藝術中學，又名濟南第一職業中等專業學校）讀二年級，結識了一批文友。來往較多的有馬吉峰（又名馬蜂）、吳稚聲、王大同、丁里（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常常在一起談論文學創作。大明湖畔，秋柳亭裏，是他們流連忘返的處所。

春夏之際，濟南高級中學一個叫李樹慈的學生找到張春橋，要發起一個文學組織「華蒂社」，「華蒂」，即英文“WHAT”。上海《文學》月刊1934年7月號（一周年紀念號）上報導這個組織的情況說：「華蒂社：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個人。如李樹慈、金燦然、馬蜂、吳稚聲、張春橋、孫任生等，都是發起的人。」「華蒂社最發達的時候，社友達六十餘人，出版了兩個周刊，一個月刊。」張春橋在《華蒂》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有創刊號的〈銀玲〉、第二期（一卷二期）的〈秋〉<sup>⑫</sup>。

「華蒂社」到底是個甚麼性質的組織？1976年11月13日，李樹慈這樣交代<sup>⑬</sup>：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濟南由黃僖棠介紹，參加「中華革命同志會」的，後改為復興社。在山東省的國民黨復興社正副頭目是秦啟榮、黃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黃僖棠授意我，以編文藝刊物為誘餌，收買拉攏一批青年學生，成立了「華蒂社」。這個組織是由我和張春橋、馬吉峰等人發起的。刊物也以《華蒂》為名。「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之意，以使這個反動組織的政治性質更加明確。

復興社給我的任務是：利用編這個所謂文藝刊物，為國民黨反動派跟共產黨爭奪青年，抵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青年運動；通過分發、推銷《華蒂》刊物，跟學生聯繫交往，探聽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情況，為復興社提

供情報。張春橋是「華蒂社」中堅份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介紹了陳慶璋參加「華蒂社」。張還模仿被魯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種人」的情調，給《華蒂》刊物寫了五、六篇稿子。他還拿着《華蒂》刊物到各學校去分發、推銷。

復興社，全名「中華民族復興社」，又稱「藍衣社」，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系特務組織。那麼，張春橋是否知道和參加了復興社？1955年11月20日，李樹慈向中央戲劇學院組織交代通過「華蒂社」發展復興社成員問題時，曾說：「我記得曾要金燦然發展朱義玉、余文明等發展張春橋。但他們是否參加了，我現在記不清楚，不能肯定。朱義玉參加的可能性大些。」<sup>⑭</sup>無論張春橋是否參加過復興社，他後來對「華蒂社」受復興社操縱的背景是清楚了。1944年，張春橋向黨組織交代說<sup>⑮</sup>：

還認識一個叫李樹慈的，他組織一個文學團體叫「華蒂社」，據說是「WHAT」的意思，後來聽說他是藍衣社，「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前此，我曾給他的刊物寫過文章（內容記得是寫[19]31年大水災的），以後就不敢來往了。

張春橋並沒有把自己是「華蒂社」發起人的詳情和盤托出。1956年，當上海市委核查他的歷史，問到「華蒂社」問題時，他才比較詳細地交代<sup>⑯</sup>：

時間是一九三三年，我在初中讀書時，已經記不起是甚麼人介紹的了，認識了李樹慈（束絲是他的筆名）。他辦《華蒂》月刊的時候，曾經約一些當時的文學青年寫稿，我也是被邀的一個，並且給他們寫了一篇稿子，內容是寫魯西水災的，據我記得這篇文章並沒有錯誤，因為一九三七年我還想把他〔它〕收集在一本小冊子裏加以出版。當時我的政治覺悟雖然不高，但對國民黨是沒有甚麼好感的。我在自傳裏已經寫了當時我的思想情況。不過，現在看來，我當時對李樹慈這樣的人也沒有惡感，以為他也是一個文學青年。

不久，我就聽到傳聞說李樹慈是藍衣社份子，感到給他寫稿是上當，就不和李樹慈往來了。

過去我一直沒有把它當作我的一個甚麼問題。這說明我對這個問題是不夠嚴肅的。

在1930年代複雜的社會中，十五六歲的青年學生初涉世事，並不能決定他們以後的道路和命運。如前面說到的金燦然，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馬列學院研究歷史，任范文瀾的助手，參加編寫了著名的《中國通史簡編》。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在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含冤而逝。然而，即使在文革中給他扣上的種種罪名裏，也沒有「特務」這一項。

與金燦然同樣作為「華蒂社」發起人，同樣到延安參加革命，同樣任新中國建國之初新聞出版事業負責人之一的張春橋，在文革中卻變成了殘酷打擊當年文友和同志的元兇。可見歷史要蓋棺論定，並不在早年一時一事。

同樣作為「華蒂社」發起人，同樣到延安參加革命，同樣任新中國建國之初新聞出版事業負責人之一的張春橋，在文革中卻變成了殘酷打擊當年文友和同志的元兇。可見歷史要蓋棺論定，並不在早年一時一事。

### 三 關於「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瘋狂反對魯迅」

1935年下半年，中共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以周揚、夏衍等人為主的黨內領導者，認識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確實存在着「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於年底決定「左聯」自動解散，並籌備成立了新的「中國文藝家協會」。而魯迅對此產生抵制情緒，表示「現此翼已經解散，別組甚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sup>①</sup>。「也要聯合國民黨，那些先前投敵的份子，是最歡迎的了。」「我確是不容易改變，就算記住敵人的仇恨是一種錯誤罷，也就只好錯誤了……不念舊惡，甚麼話！」<sup>②</sup>

1936年，爭論已經公開化。6月7日，周揚發表〈關於國防文學〉文章，批評關門主義和宗派情緒。8月15日，馮雪峰替魯迅擬稿，經魯迅修改和增補，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進一步明確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並猛烈抨擊「國防文學」。張春橋一開始就堅決地支持代表上海左翼文化運動黨組織的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於1936年3月15日以「狄克」為筆名在《大晚報》副刊〈火炬〉發表了一篇批評《八月的鄉村》的文章，題為〈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魯迅於4月16日寫出〈三月的租界〉，予以反駁<sup>③</sup>。當時像這種爭論舉不勝舉，張文顯然是緊跟上海左翼文化運動黨組織的行為，他後來到了延安仍然堅持認為這是追隨「黨的方針」。魯迅當時也沒有視為敵我之爭，說：「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sup>④</sup>

剛粉碎「四人幫」，周揚尚未解放時，《人民日報》的文章這樣說到張春橋和魯迅的關係<sup>⑤</sup>：

就是這個張春橋，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跟周揚等「四條漢子」一起，充當「圍剿」魯迅的急先鋒，充當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的一條叭兒狗。他在反動的《大晚報》上，化名「狄克」，拋出黑文章，攻擊魯迅「把一個良好的作者送進墳墓裏去」，其目的就是要挾魯迅向他們的「國防文學底路線」屈服，向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屈服。

當時，在一些左翼作家和魯迅的論爭中，比張春橋文章激烈得多，爭論問題大得多，被魯迅斥為「昏蛋」的，大有人在。顯然，狄克文章的背景和影響，當時並沒有被人當作一回事。因此，張春橋仍然繼續在進步文化界中積極地參與活動，「狄克」的筆名也繼續多次使用。

至於張文發表在國民黨特務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也不能說張受其指使「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當時崔萬秋的公開身份是進步作家和報刊

張文發表在國民黨特務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也不能說張受其指使「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當時崔萬秋的公開身份是進步作家和報刊編輯，秘密特務身份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因此，一些進步作家與他來往，在他主編的副刊上發表文章不足為奇。

編輯，秘密特務身份只有國民黨特務中極少數人知道，因此，一些進步作家與他來往，在他主編的副刊上發表文章不足為奇。「國防文學」的口號最早就是周揚1934年10月27日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提出<sup>20</sup>。張春橋一到上海，就結識了崔萬秋，並積極為《大晚報》寫稿，換取稿酬。這一時期，《大晚報》是他發表文章最多的報刊之一。

## 四 關於「偽造入黨歷史」

關於「偽造入黨歷史」，此事最為複雜，也是張春橋一直苦惱向黨組織說不清楚的歷史<sup>21</sup>。

1935年，張春橋離開濟南到上海，住在陳白塵家的時候，結識了一批進步作家，其中有一位名叫尤兢，即後來改名于伶的戲劇作家。10月的一個下午，張春橋從生活書店買書出來，正好碰上尤兢，對他說：我們在馬路上隨便走走吧。閒談了一陣後，尤兢問：「你要不要加入一個文藝團體？」正苦於無人賞識的張春橋立即說：「當然想了，不過誰肯介紹呢？」「我就可以介紹。過兩天有個人來找你，手裏拿一張《申報》，你頭一句話說……就接上頭了。詳細情況我會告訴你。」

興奮的張春橋等了兩天，果然來了一個名叫陳鶴的人，告訴他要他參加的團體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左聯」，要他寫一份自傳，等候審查。大喜過望的張春橋立即寫好自傳交上。後來，他接到通知，被批准加入「左聯」。以後，又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但只過「左聯」的組織生活。在「社聯」裏，張春橋參加了學習活動，主要是學習拉比杜斯著，李達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恩格斯著，吳黎平翻譯的《反杜林論》、沈志遠著《黑格爾與辯證法》等。有時也談論時事，還參加了示威遊行，還在夜裏出去張貼過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標語。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就在狄克文章發表後不久的1936年4月，一個叫老宋的人忽然鄭重地問張春橋：「你願意不願意參加共產黨？」張春橋回答說：「我當然希望加入。」張春橋早已猜測到老宋是黨員，但沒有人說明，他也不敢問。老宋說：「過幾天，在『社聯』負責和你聯繫的那個泰國華僑林福生來找你談話。」幾天後，林福生果然如約而來。他說：組織上對你已經了解了，你可以不再寫自傳。他又告訴了張春橋黨的誓詞：對黨的事業忠誠到底，嚴守秘密等。又過了幾天，老宋通知張春橋到楊樹浦一個工人家裏開會，一共有四個人，指定一位姓王的工人作「支部書記」，分配張春橋負責宣傳工作。

就這樣，沒有經過審查，沒有寫自傳和填表，沒有宣誓，沒有經過入黨前的預備期，張春橋就奇怪地被接納為「中共黨員」，而且一下子成了「支部宣傳委員」。

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虹橋機場中國駐軍大舉進攻。9月初日軍已經逼近北火車站，南站也被炸毀，只有西站可通車。馮雪峰、胡風等一批進步文化人士，都準備離開。9月7日這一天，老宋找到張春橋，告訴他自己準備到後

關於「偽造入黨歷史」，此事最為複雜，也是張春橋一直苦惱向黨組織說不清楚的歷史。1935年，張春橋離開濟南到上海，沒有經過審查，沒有寫自傳和填表，沒有宣誓，沒有經過入黨前的預備期，就奇怪地被接納為「中共黨員」，而且一下子成了「支部宣傳委員」。

方去工作，今後由一個姓王的來和他聯繫。張春橋急切地問：「我能不能到濟南去？因為那裏我熟人多，語言也相通，便於工作。」老宋同意了。以後，張春橋和老王見了兩次面。他問：自己去濟南組織關係如何轉？老王只含糊地回答：現在打仗，沒法轉，我要去江北也是一樣。你把地址留下，以後轉過去。

9月13日，張春橋把行李和書籍存放在于黑丁家裏，登上了離開上海的火車。然而濟南也危急起來了，日軍已經佔領了黃河北岸。徘徊之際，張春橋在書店裏買到了幾份《救亡日報》，上面登着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林彪共同署名的招生啟事及延安的通訊，在三原、西安、延安三地設立招生處，接待從各地前來的報名者。

張春橋和父親張開益商量去延安，張開益說：「一家人分散太遠了不好。國共合作到底能堅持多久？」張春橋說：「看樣子，國共合作不會一天兩天就要破裂，以後的天下不會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了。如果日本人來了，你還可以做事，對我可不利。」又說：「我還可以把二弟秋橋也帶到延安去，家裏也能減少負擔。」談了兩個晚上，張開益終於答應了，給了張春橋路費。這時候，濟南城裏已經疏散得稀稀落落。張春橋正住在山東同鄉趙君弼家裏。12月初，張春橋對趙君弼說他要去延安。趙君弼說：「你去吧，我得留下來幹。」張春橋說：「你留下幹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幹好了，就幹下去，如果幹不好，就回來再找你。」

因為徐州被日本飛機轟炸得厲害，張春橋就帶着張秋橋從巨野向南出發，有時步行，有時乘車，穿過魯西平原，經過商丘到達開封，在那裏乘坐隴海線火車到達西安，已經是12月底了。在西安，他們本想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去聯繫，但恰好看見汽車站有賣到延安的車票，於是，1938年1月3日買了票就登程出發。

1月7日，張春橋一行到達了延安。他先去找成仿吾。因為他在上海的時候，曾經把自己參與編輯的《文化新聞》往延安寄了很多，得到成仿吾用「石厚生」的名字寫來的回信，予以鼓勵。在濟南決定去延安時，張春橋已給成仿吾寫了一封信，問能否去延安，但未等到回信就出發了。

成仿吾還記得張春橋，聽了情況介紹以後，當即答應把張秋橋編到陝北公學學員隊。因為張春橋稱自己在上海入過黨，成仿吾就把他介紹到陝甘邊區政府招待所住下，要他直接到中央組織部談自己的組織問題。

中央組織部的賈震和張春橋談了幾次話。張春橋說：自己的「組織關係」是從上海回到濟南以後沒有轉去。賈震看了他寫的反省式自傳，又要他寫了在上海工作情況和失掉組織關係的報告。問他：「你對目前革命有甚麼意見？」張春橋想起離開濟南時父親擔心國共合作不能長久、一家人要天各一方的話語，就回答說：「要絕對地鞏固國共合作。」隨即又補充一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sup>②</sup>他所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設想的國共聯合政府之類的共和國，名稱相同純屬巧合。

在招待所住了將近一個月，張春橋又寫了一個補充報告。2月初，賈震通知他，因為沒有組織關係，也沒有人能證明，因此組織關係不能恢復，但是可以先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陝北公學政治部，任校刊編委會的秘書，又來到了成

1938年1月，張春橋一行到達了延安。他帶來的弟弟秋橋在3月迅速入了黨，而他仍然是「黨外人士」。他四處奔波，找到原來在上海一起工作過的同志，也找到了當時上海黨組織的最高負責人周揚，然而，他們都無法證明張春橋是黨員。

仿吾的身邊。為了聯繫已經畢業的陝北公學同學，擴大影響，學校成立了陝北公學同學會，張春橋被調去負責對外聯絡工作，包括寫覆信，寫稿件到國民黨控制地區去發表。

張春橋的「組織」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他帶來的弟弟秋橋也在3月迅速入了黨，而他仍然是「黨外人士」。他四處奔波，找到原來在上海一起工作過的同志，也找到了當時上海黨組織的最高負責人周揚，然而，他們都無法證明。周揚只謹慎地為他寫了一個證明，大意是：在上海時期的左翼文化活動中見過張春橋（在梅益同志家裏和他見過一面），知道他是從事革命文學活動的，但當時黨組織關係很亂，無法證明他是黨員。

張春橋不能再等下去了。8月，由陝北公學校部秘書、黨支部書記顧光斗和陝北公學同學會工作的黨小組長雄飛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此之前，他到底有沒有入過黨？

1950年10月，在填寫〈華東軍政委人事局製職員簡歷表〉的時候，張春橋仍然堅持寫道<sup>②</sup>：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經吳成志林福生介紹入黨。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經顧光斗、雄飛介紹重新入黨。〔19〕39〔年〕二月轉正。

1955年11月，張春橋任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代書記後<sup>③</sup>，再次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要求確認他1936年4月起的黨齡。並且提出了請當時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委員、林業廳廳長的宋振鼎，即他所說的「吳成志」，給他寫一個證明材料。但是，調查的結果並不如他願。宋振鼎只是含糊地說<sup>④</sup>：

張春橋同志在上海時，確曾參加過社會科學者聯盟。

張春橋入黨時間我已記不清（我記得離抗戰時間不遠），可能是一九三七年，不是一九三六年。那時上海黨對發展黨員很嚴格，一般的只放在黨外工作，但發展手續又很不完全，我只記得張春橋是提到黨組織批准的，由吳仲超通知我同意張入黨，既無明確的介紹人，也沒有填表。

這些話充滿着矛盾。宋既說當時「對發展黨員很嚴格」，又說「同意張入黨，既無明確的介紹人，也沒有填表」。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張春橋自己填表時寫的入黨介紹人「吳成志」，否認張有入黨介紹人和填過表。那麼，張春橋的「組織關係」沒有轉到濟南，就好解釋了。因為他既然當時沒有寫過申請、填過表，也沒有交過自傳，也就根本沒有「組織關係」可轉。

張春橋自己填表時寫的入黨介紹人「吳成志」，否認張有入黨介紹人和填過表。那麼，張春橋的「組織關係」沒有轉到濟南，就好解釋了。因為他既然當時沒有寫過申請、填過表，也沒有交過自傳，也就根本沒有「組織關係」可轉。



1955年任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代書記的張春橋

再找當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吳仲超，他說了一番很值得推敲的話<sup>②</sup>：

我和張春橋同志以前沒有見過，所以不認識，解放後到上海才認識起來，關於張春橋同志何時入黨及一九三七年他到濟南後為甚麼沒給他轉關係，我已記憶不起來了。

那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獄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認識，當時都在找黨的關係，我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經張執一同志才與黨取上聯繫，組織綢廠工作委員會，從此又開始黨的活動。宋振鼎同志出獄後在上海曾聯繫了一些脫黨的同志，後來當和黨取上聯繫不久恢復了他的黨籍。

他最後說：「如果宋振鼎同志說張春橋同志是入黨的，那麼張春橋同志的入黨時間應該是一九三六年底或一九三七年初。」<sup>③</sup>

從這些話，我們可以分析出以下事實：

首先，吳仲超在建國前根本沒見過張春橋，這時也沒有證明張入過黨的意思，只是說「如果宋振鼎同志說張春橋同志是入黨的」。這實際上否認了宋振鼎所說「由吳仲超通知我同意張入黨」的說法。其次，無論是吳仲超還是宋振鼎，1936年4月都不可能介紹張入黨，因為他們自己當時還沒有和黨組織取得聯繫。

考慮到調查時張春橋已經取得了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代書記的地位，因此，吳仲超的回答比較模糊可以理解，但還是實事求是的。

面對調查結果，張春橋又是如何自圓其說的呢？他說<sup>④</sup>：

我想了幾天，實在弄不準確了，我記得當時我還穿着夾衣，下着細雨，我一直記得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現在我想可能是我記錯了，正確的日子應當在一九三六年秋，或者一九三七年春，因為穿夾衣這一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如果是一九三七年，我為甚麼記成一九三六年呢？我到現在還想不出一個解釋。

我對記時間數字特別低能，到現在我自己的、父母的、孩子的生日我總是問了忘、忘了問一直記不得，真是苦惱的事。我希望從自己入黨的日子記不清這件事取得教訓。

為了符合「4月」，他很快給自己重新定位了一個從來沒有說過的「1937年4月入黨」的新說法<sup>⑤</sup>。以後，他即照此改寫了個人歷史。然而，這無法令人信服。一般的人對日、月或許會記錯，記錯年頭的卻很少。一般的人對一般的事容易記錯，對入黨這樣關乎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不大可能記錯年頭。尤其是張春橋，連自己少年時代何時何地發表了哪篇文章，都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怎麼會記錯入黨年頭這樣的政治生命的起點？儘管他一再責怪自己「低能」，卻還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其實，張春橋「1936年4月入黨」的說法也並非憑空捏造。問題在於當時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複雜情況。

張春橋「1936年4月入黨」的說法也並非憑空捏造。問題在於當時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複雜情況。原來，張1936年4月加入的是由一些和黨組織失去聯繫的黨員自行成立的組織，並非正式的中共組織。因此，張在上海根本沒有加入過中國共產黨。

紅軍長征以後，上海中共黨組織與中央失去了聯繫，直到1936年5月馮雪峰受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周恩來委派，作為中央特派員再次回到上海，才開始了重建中共上海黨組織的工作。在此之前，在上海自然存在或自行建立的黨組織，有上海的中國共產黨臨時工作委員會（「臨委」）和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等近十個系統，馮雪峰都分別進行了考察和處理，貫徹了中央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方針。他還陸續通過王堯山等，聯繫上一部分失去組織關係的黨員，叫他們暫時以個人的名義根據中央的政策去從事活動。這種情況一直到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劉曉到上海負責籌建中共江蘇省委時為止。

那麼，張春橋參加的是甚麼組織呢？這個謎底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完全揭開。

1976年10月18日，吳仲超寫的材料明確指出<sup>②</sup>：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人成立了一個預備黨員委員會，這是個非法組織。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這個組織。

解放前我不認識張春橋，文化大革命中，從外調的小將們口中才知道那個委員會內有張春橋。

12月25日，宋振鼎寫的揭發材料說<sup>③</sup>：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間，我（化名吳成志）與原社聯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曾經我介紹張春橋參加為預備黨員。這個組織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我們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找我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們當即解散，並通知到所有參加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此後，我再未介紹過張春橋入黨。

原來，張春橋1936年4月加入的是由一些和黨組織失去聯繫的黨員自行成立的組織，並非正式的中共組織。未經上級黨組織批准而成立，根據黨章當然是非法的，被解散也是正確的。因此，張春橋在上海根本沒有加入過中國共產黨。

如果能將自己的黨齡推到「七七事變」以前，將會是一種政治資本。張春橋的目的雖然暫時地得逞了——把入黨時間定為1937年4月，但是也付出了代價——向黨隱瞞歷史真相。這成為他日後的一個政治歷史問題。

## 五 關於「叛徒」

當然，這種組織起來的群體雖然不能稱為黨組織，但也不能簡單地稱張春橋「偽造入黨歷史」，「叛徒」更是談不上。所以，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審查後曾作出結論：恢復張春橋1937年4月至1938年8月重新入黨前的一段黨籍。由此，也可以知道，前述康生舉證說吳仲超知道張春橋是叛徒的說法，也不成立。因為吳無論在張任要職時還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都堅持說在建國前不認識張。

至於康生所提出的另一個證人王觀瀾，與江青有關，但與張春橋無關。1977年中共中央關於「四人幫」的罪證材料上，說「江青是叛徒」，唯一依據就是農業部人事司副司長、王觀瀾夫人徐明清的交代。江青1934年曾在徐領導下從事革

林彪集團要向全國昭示張的「叛徒」歷史，康生根據毛批評「四人幫」的風向來揭發張是「叛徒」，周恩來多次以「叛徒」和「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來阻止毛對張的信用，都是當時特定政治鬥爭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澤東最終沒有把最高權力託付給張春橋。

命。但是，徐後來寫出更正材料說明，她所揭發的「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那是由專案組人員口述，她被迫執筆寫成的。她不承認能證明「江青是叛徒」的問題。

張春橋的要害問題並不在此，而在於他明明接到通知，告訴這個組織被解散，仍然要在以後的長時間裏稱自己當時加入了黨組織。他為甚麼要堅持這樣說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促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黨組織得到了大規模發展，此前和此後的中共黨員在建國後的政治待遇是有較大差別的。如果能將自己的黨齡推到「七七事變」以前，將會是一種政治資本。張春橋的目的雖然暫時地得逞了——把入黨時間定為1937年4月，但是也付出了代價——向黨隱瞞歷史真相。這成為他日後的一個政治歷史問題。

經過上述三方面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張春橋雖然在歷史上有問題，但並不是叛徒和國民黨特務，而且這些問題在文革前已經交代過，有組織結論。

文革中，林彪集團要向全國昭示張的「叛徒」歷史，康生根據毛批評「四人幫」的風向來揭發張是「叛徒」，周恩來多次以「叛徒」和「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來阻止毛對張的信用，都是當時特定政治鬥爭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澤東最終沒有把最高權力託付給張春橋。

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值得深思。

《水滸傳》第一回有個故事：「洪太尉誤走妖魔」，說的是宋朝廷派洪太尉去華山進香，誤揭了天條，放出種種「妖魔」，使得「天下大亂」。那麼，究竟張春橋、姚文元原本就是「妖魔鬼怪」，放他們出籠才掀起了文革？還是文革的特定環境揭去了民主、法制的「天條」，使得一些雖然有嚴重問題但還不至於是「敵人」的人野心急劇膨脹，得以為所欲為，終於變為「妖魔鬼怪」？

一些材料和著作包括葉永烈的《張春橋傳》，把張春橋描述成從小就壞透了的惡棍，一參加革命就是混進來的「階級異己」份子——十六歲就參加法西斯組織，十八歲就接受國民黨特務指令攻擊魯迅……<sup>④</sup>且不論事實如何，僅這種思維定式，就將一個深刻的問題引向了簡單化的誤區。這仍然是傳統的「階級鬥爭」思維。當然，從寫作傳記的角度，這也是最省事、最保險的辦法。然而，它不僅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也不能發人深省。

馬克思在《資本論》(*Kapital*)序言中，寫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sup>⑤</sup>：

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裏涉及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同樣，張春橋的產生，也是一種歷史現象。在「左」的環境裏，這種人才能得道升天。有這樣的土壤和環境，沒有張春橋、姚文元，也會產生「趙春橋」、「錢文元」之類的人物，這不是他們的個人早期活動經歷所必然決定的。這也是一種「自然史」。

## 註釋

- ① 1975年張春橋在《紅旗》雜誌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重要文章後，「四人幫」控制的報刊(如上海《學習與批判》雜誌)曾發表多篇文章，稱頌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第四個里程碑」。前三個里程碑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理論學說。
- ②② 張春橋自填〈幹部履歷表〉，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製，1960年11月4日。
- ③ 〈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原文印件，1972年1月10日。
- ④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75。
- ⑤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4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87、688。
- ⑥⑥ 中共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976年12月，頁50-51；48，見中發(1976)24號文件。
- ⑦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364、365。
- ⑧ 據採訪有關當事人的回憶。
- ⑩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 ⑪⑫⑬⑭⑮ 中共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1977年3月，頁2-28；8、9；6；29；29，見中發(1977)10號文件。
- ⑯ 李樹慈交代材料，195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檔案。
- ⑰ 張春橋：〈反省自傳〉，1944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檔案。
- ⑱⑲ 〈關於張春橋同志入黨時間及失掉關係問題的審查結論〉附件：〈張春橋同志的補充材料〉，1956年4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檔案。
- ⑳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頁350。
- ㉑ 馮雪峰：〈回憶魯迅〉，載《雪峰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頁129。
- ㉒ 周揚：〈關於國防文學〉，《文學界》(上海)，1936年6月(創刊號)，參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1919-193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524；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載《魯迅全集》，第六卷，頁526-38；狄克：〈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大晚報》副刊〈火炬〉，1936年3月15日；魯迅：〈三月的租界〉，載《魯迅全集》，第六卷，頁513-15。
- ㉓ 魯迅：〈三月的租界〉，頁515。
- ㉔ 魯迅研究室大批判組：〈魯迅痛打落水狗張春橋〉，《人民日報》，1976年10月31日。
- ㉕ 企：〈國防文學〉，《大晚報》副刊〈火炬〉，1934年10月27日。
- ㉖ 下文的陳述，如果沒有給出出處，均來自張春橋：〈反省自傳〉，1944年11月15日。
- ㉗ 張春橋在延安接受中組部人員登記時的談話記錄，193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檔案。
- ㉘ 張春橋自填〈華東軍政委人事局製職員簡歷表〉，1950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檔案。
- ㉙ 〈關於張春橋同志入黨時間及失掉關係問題的審查結論〉附件：〈宋振鼎同志的說明材料〉，1956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檔案。
- ㉚⑳ 〈關於張春橋同志入黨時間及失掉關係問題的審查結論〉附件：〈吳仲超同志的說明材料〉，1956年3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檔案。
- ㉛ 張春橋答覆上海市委關於審查他歷史的兩個問題的信，1956年4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檔案。
- ㉜ 葉永烈：《張春橋傳》(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
- ㉝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01、102。

陳東林 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歷任陳雲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